

惊世之书

百年书窗中的文学风景

周伟◎主编

编选一个世纪以来
报刊上发表的文学
畅销书的书评，着
重于名著和名家书
评。展示中国近现
代文学中数百部文
学作品的时代风采
与恒久魅力。

文艺丛书 第三种

惊世之书

百年書窗中的文學風景

周伟◎主编
白秋沙枫◎选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代印记—穿行于中国百年报刊之林丛书(第四卷 惊世之书)/周伟主编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2.9

ISBN 7-80145-582-7

I.时… II.周… III.报刊—文化史—中国—现代 IV.G219.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5999 号

主 编: 周伟

出 版: 光明日报出版社

发 行: 新华书店

电 话: 010—62559981(发行)

82645453—608(著作权)

E - mail: gmmj@263.net

印 刷: 北京国防印刷厂

开 本: 1/16(787×1092)

印 张: 168

印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字号: ISBN 7-80145-582-7

定 价: 198.00 元(全六册, 每册 33.00 元)

文章报国 薪火相传

周伟

一张张老报纸似情感的堆积，历史的沉淀，文化的韵律。

往事如烟。100年，在历史长河中也仅是弹指之间。对于某个人或某代人来讲，却是逝去多年，渐渐淡忘。那一页页发黄的老报纸，整整100年间就这样默默地沉寂着，这是它的委屈。一旦有机会翻阅它，便会发觉它的美妙，它的深沉，它的动人。这种感觉不会随时光而流逝，不会因久远而腐朽，相反，它像一坛老酒，愈陈年愈醇厚，一旦打开来，扑鼻的是浓香，回味悠长。尤其是浪漫的怀旧情感涌上心头时，这坛老酒便愈是具备了文化的底蕴，愈是挥之不去。老报纸就是这样一坛世纪陈酿。

薪火相传。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每一代都是一条链子的一个环，每一代人都是从上一代手中接过来的接力棒——薪火相传。百年老报纸就是这样，记录历史，见证时代。一代代报人笔走龙蛇，每日援笔濡墨，著述不辍。嬉笑怒骂，道出人生百态，写尽世间万象；议论风生，严谨中有风趣，诙谐中透着老辣。新闻是历史的草稿，老报纸的100年是前后交融的一本书，一条线。这100年，可以涵盖中国的20世纪，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是一部中华民族不断奋斗与抗争的历史，是一个国家追求进步与光明的生动描摹。

文章报国。“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行准则。中国报人的爱国传统历久不渝，他们理智而有豪情，勤于思而敏于行，静坐书斋而心系天下，盼望中华富强。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振兴中华更成为报人关注议论的主题。他们以文报国，以匡扶时世为己任，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贯穿到文章之中，力图以事实和言论来指引国家的走向，社会的发展。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强调爱国主义和社会责任成为办报的主旋律。

风雨沧桑。100年间，民族报业经历过无数风霜雨雪，从不畏难，从不退缩，这种精神深深地刻在一张张发黄的老报纸上。中国的民族报业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小到大，经历了繁荣与萧条的起起落落，一直到现在全国拥有2000多家报纸，8000多家期刊的空前繁荣时期，从铅与火、纸与笔到光与电，从单一到多样的新闻体裁，这里，无不交相辉映着民族报业一百年风雨历程的真实写照。报纸的发展与国家的进步，报业的繁荣与民族的解放，报刊的兴盛与人的自由，联系是何等密切，从这个意义上讲，报业发展史就是一个民族的解放史，就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就是人类文明的足迹。

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报纸与文明、与进步都是不可分的。进入二十一世纪，重读旧报，重温旧言，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一种特殊的文化留恋，而且给我们一个立志不负前人的激励，一种为中华之崛起的鼓舞。

于是，百年报刊浓缩成一本美妙的书。

书评中的文学景观

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华民族在艰难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冲破了几千年传统的精神桎梏,不懈地追求人性的自由解放、国家的民主富强、社会的进步以及种种人类永恒的梦想。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在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满怀由时代变迁而生发的对国家命运、个人命运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命运三者关系的思考,在上个世纪里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折射出社会的形态、现代人的思维方式以及生活景观的全面变迁。书评,是透视文学作品的一个棱镜。因此,在 21 世纪开始起步的今天,在文学的历程刚刚跨过世纪之门时,我们萌发了将这一百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化图景在书评这个小小棱镜中展现的想法。

一、世纪初文学的兴起

上个世纪初,由于政治上改良运动的需要,印刷事业的发展以及近代新兴都市的繁荣和报纸期刊的创办,小说在这一时期大量产生,其社会地位不断提高。《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小说原理》(夏曾佑)、《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狄平子)、《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王无生)、《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陶佑曾)、《余之小说观》(徐念慈)等文先后发表,强调小说的政治意义及其在社会教育上的作用。在梁启超“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理论倡导下,小说成为新派知识分子暴露旧世态、宣传新思想的有力工具,同时直接出现了一批职业作家。“政治小说”、“社会小说”、“科学小说”等名目应运而生。被鲁迅称做“谴责小说”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受到普遍欢迎。此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也相应地产生了以章太炎和南社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和《孽海花》、《警世钟》等作品。

五四以后，中国社会进入新民主主义时代。白话这种形式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革命，促使文学和人民群众大大接近了一步；在作品内容上，也具有不同于旧民主主义文学的崭新特点。“五四”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许多作品，猛烈攻击封建制度、封建道德，揭露军阀统治的黑暗现实，表现了与旧传统彻底决裂的精神，同时提出了知识青年挣脱旧家庭束缚、争取恋爱婚姻自由、探索生活道路等要求。部分作品还正面描写了下层人民的苦难，表达了对劳动者命运的关切，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则表示同情和欢迎。这些都成为“五四”新文学高于历史上进步文学的重要方面。其中一些处于无产阶级领导及影响下的革命民主主义作家的创作，获取了突出的成就。鲁迅的《呐喊》、《彷徨》，通过一系列典型形象的成功塑造，概括了异常深广的时代历史内容，真实地再现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极度痛苦，并怀着对未来的信念探索革命的前途，显示出深刻的革命现实主义的特色。郭沫若的《女神》，借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及自然形象，以宏大的气魄，奇特的想象，瑰丽的语言，歌唱出彻底叛逆、热望新生的时代声音，成为具有现实基础的革命浪漫主义的作品。他们的创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使两种占主要地位的创作方法——由《新青年》、文学研究会所提倡的现实主义（当时称“写实主义”），以及由创造社所代表的浪漫主义，通过实践得到了高度的发展。“五卅”以后，以反帝为内容的作品多了起来。一部分作家开始走向实际斗争，主要精力不在创作方面，他们的作品一时似乎少了，但总的说来，时代却正在酝酿着一个文学发展的新阶段。

初期白话散文中，游记、通讯报告占有重要位置，稍后便有抒情小品、随笔出现。这些在当时都属于所谓“美文”类。用白话写这类文字，足以打破“白话只能作应用文”的陈腐看法，含有向旧文学示威的意思，但在内容上，还是以抒写闲情逸致者居多。在早年游记通讯中，较有社会意义的作品，应推

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瞿秋白怀着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向往,最早向自己的人民“拨开”国内外反动派所散布的“重障”,真实报道了“俄罗斯红光烛天,赤潮澎湃”的现实以及苏俄“无产阶级创业的艰辛”。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新与旧、革命与反革命之间那种复杂、尖锐而曲折的斗争,都在作品中得到了反映。许多篇章记述了劳动人民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战胜敌人、排除困难的英勇业绩,表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当时生机勃勃的革命气象。文学研究会在创作上承继和发扬了《新青年》的文学“为人生”的主张,取得了较大成绩,是把新文学推向前进的第一个团体。叶绍钧、冰心、朱自清、王统照等人的创作,大多关切着现实人生,描绘着作者比较熟悉的人和事,探索着“五四”以后知识青年中风靡一时的“人生究竟是什么”等问题。虽然作者各自的思想并不相同,对问题的答案也不相同,但他们对当时黑暗污浊社会采取不满和揭露的态度则是大体一致的。从“五卅”前夕文艺领域内感伤苦闷气氛弥漫,到一九二八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兴起,其间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被作为口号提出而且形成运动,这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洗礼的结果。一部分作家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作品多描写党所领导的群众革命斗争,努力塑造革命者和工人、农民的形象,显示了作者可贵的革命激情,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是,由于运动倡导者大多数还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他们暂时还不能完全分清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界限,对文艺的特征又有所忽视,再加上不同程度地缺乏表现这类题材所必需的生活积淀,这就使创作不能不受到影响。一九二八年,叶绍钧的长篇小说《倪焕之》则真实地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历程和精神面貌,反映了“五四”、“五

卅”这些规模壮阔的革命运动曾经给予知识青年的巨大影响。

二、三四十年代文学的发展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促进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作品的现实性、战斗性显著加强。现实斗争,尤其是动荡着的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得到了较多和真实的描绘。“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之后,表现抗日救亡的作品广泛出现。一部分作家参与或亲历实际革命斗争,创作面貌有所变化:再现生活的历史性具体性有所增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一些青年革命作家的作品中也得到发扬。茅盾的《子夜》在较大规模上真实地描画出三十年代中国的社会面貌,并揭示其未来动向,这是作者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相应的艺术手段观察和再现生活的结果。其间还出现了《家》、《雷雨》、《日出》、《骆驼祥子》等优秀作品。从文学形式方面看,长篇小说和戏剧创作在这个时期获得了较大的进展。

“七·七”事变以后,抗战的炮火广泛地吸引作家关心现实,普遍激发起作家的爱国感情和创作热情。许多作品迅速反映生活,歌颂前线和后方的新人新事,形式上趋于通俗。适应着战争初期形势的需要,诗歌、报告文学、戏剧都有较大发展,小型作品尤其活跃一时。乐观主义气息在一些民主主义作家的创作中也有所增强。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的实际发展情形表明,只看到某些一时表象而产生的“乐观”幻想,很容易在形势比较严峻时又变为失望悲观。如果说抗战前期国民党统治区创作的主要成就还是在暴露、讽刺和战斗的作品方面,《腐蚀》、《屈原》、《淘金记》等便是这方面的优秀之作。进入延安和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作家们的创作,则由于在新的天地中放声歌唱并开始描写新的对象而呈现不同的特色。延安文艺整风之后,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指导下,解放区群众文艺运动蓬勃发展。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在小说的民

族化、群众化方面做出了可喜的贡献。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名篇成功地塑造了翻身农民的形象，深刻反映了40年代解放区农村的变革。

出现较晚的解放区长篇小说大都注重表现重大题材。柳青1947年完成的《种谷记》是描写农村发展生产的优秀作品，草明的中篇《原动力》是工业题材的成功之作，反映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斗争的作品有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

解放区军民可歌可泣的斗争生活为新英雄传奇提供了发展的土壤，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之后，马烽、西戎又合著了《吕梁英雄传》，两部小说深受欢迎。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是这一品种的佳作。

皖南事变之后，国统区中篇小说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些作品已不再只流连于战争的表面描写，而是对战争背景下的现实生活进行深入的挖掘。这时期著名的作品有：以茅盾的《腐蚀》、沙汀的《淘金记》等为代表的反映四川农村生活的系列小说，艾芜的《丰饶的原野》、《故乡》、《山野》，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寒夜》，被誉为新《儒林外史》的钱钟书的《围城》等。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其对小资产阶级作家思想感情的彻底改造和作家必须长期深入生活、深入工农兵等方面所作的深刻论述，从根本上解决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解放区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是使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气象。

三、建国前后文学的新天地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第一次文代会”）召开。长期被分离在两个地区（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文学工作者终于“会师”，

并且正式确立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全国文艺工作的指导地位。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局面的结束，中国进入了和平的经济建设时期。

从文学创作方面来看，当时的大多数作家在军事胜利的鼓舞下，热情讴歌时代精神，这一时期战争文化在文学观念上的表现——诸如自觉强调文学创作的政治目的性和政治功利性，自觉运用战时两军对阵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即敌我阵营绝对分明）来构思创作，自觉强调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在创作中体现出来。这一时期，小说成就最大的是那些反映革命战争和农村生活的作品。例如柳青的《铜墙铁壁》、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等，以革命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

从1957年到“文革”前夕，长篇小说创作进入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高潮。这时期的长篇小说，不仅数量多，而且在反映生活的深度与广度方面也都有很大进展。在表现中华民族勇于反抗、敢于胜利的优良传统方面，有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部）、李人的《大波》、欧阳山的《三家巷》等；反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摧毁旧世界斗争的有：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红日》、冯德英的《苦菜花》、刘流的《烈火金钢》、曲波的《林海雪原》、杨沫的《青春之歌》、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展现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巨幅画卷的有：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康濯的《水滴石穿》等。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是描写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佳作。

四、文革中的艰难跋涉

1967年，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在《红旗》杂志第1期发表。此文称：“当我们回顾解放以来文艺斗争的历史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一条是毛泽东文艺

路线，是红线，是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历次重大的斗争，把文化革命一步步推向前进……作了长时间的准备，直到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向资产阶级全面进攻的、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直挖进周扬一伙的老巢。”文章中提到的重大斗争有：“第一次斗争，是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第二次斗争，是1954年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第三次斗争，是1954年到1955年紧接着批判胡适而展开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四次斗争，是1957年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伟大斗争。”“1958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以来的历史，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发展的历史。在这个期间，……进行了两次大斗争，即1959年的一次，最近的一次在斗争中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空前伟大的胜利。”姚文元在这篇文章中还提到了一条事实上不存在的因而在“文革”后被否定了的“黑线”：“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是黑线。它的总头目，就是周扬。周扬背后是最近被粉碎的那个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冯雪峰、丁玲、艾青、秦兆阳、林默涵、田汉、夏衍、阳翰笙、齐燕铭、陈荒煤、邵荃麟等等，都是这条黑线之内的人物。”姚文元点名批判的这些对新文学事业做出过程度不等贡献的人，都在“文革”中遭到了残酷迫害和无情打击。

在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4周年期间，《智取威虎山》等8个“样板戏”在北京同时上演，演出218场。196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称八个“样板戏”“宣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破产”，由此“样板戏”在“文革”中的主宰地位得以形成。《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并称为“江青同志”亲自培育的八个“革命现代样板作品”。之后又出现了京剧《龙江颂》、《平原作战》等第二批“样

板戏”。在这个打倒了中外传统的时代里，它们便是数量不多的公开文学作品中的“样板”，它们以舞台表演、电影播放、电台广播和语言文字等传播渠道，在全民中推行，至少在公开的层面上，它们已经成为“文革”时代精神生活的象征。

1972年新创作的《虹南作战史》、《牛田洋》、《金光大道》等小说的出版，使“文革文学”的话语建设进入了积极而有序的轨道。新创刊的和恢复出版的文学期刊为主流文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以“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为指导，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设计，“文革”开始形成自己的文学话语系统并且侧重表现两个方面：作为历史的“社会主义改造”和作为现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者都是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后者逐渐发展为侧重写与“走资派”的斗争。

五、改革开放前十年文学的新局面

1978年，思想领域发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全面反思了“文革”给人们的思想带来的禁锢。这时期的文学队伍主要是由两代作家构成，一代是在5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是在共和国初期的理想主义氛围下步入文学创作的领域，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双百”方针时期因为真实地表达了对社会或人性的感性认识，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遭到不公正的批判和打击，并在社会底层度过了苦难的岁月，“文革”结束后他们重返文坛，成为80年代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创作里充满对现实生活的干预精神和对人性的赞美，可以说是“五四”传统的精神主题在当代的再现。还有一代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其中大多数人曾在“上山下乡”中感受了民间生活和民间文化的熏陶，所以当 they 开始写作时，自然而然地从农村经验中汲取创作素材，由最初的知青题材到稍后的寻根文学，反映出新的民间化的创作趋向。

另外一些作家通过对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借鉴，大大地开

拓了表现现代人情感意识的艺术空间。起先对西方现代主义技巧的借鉴尚有形式主义的割裂感,但在许多作家的实践中渐渐地成熟起来,新的语言形式融入了民族语言的表达经验,不是削弱而是丰富了现代文学的艺术表现传统。尤其在现代诗歌的表现形式方面,以“文革”时期知识青年的地下诗歌为源头的“朦胧诗”的创作,与“五四”新文学中的现代诗传统结合起来,刷新了诗歌语言的美学原则,恢复个人话语在诗歌领域的作用。80年代末期,“新写实小说”的出现与喧闹是以“先锋文学”的中止为代价的。自“伤痕”、“反思”、“改革”、“寻根”之后,在新时期文学中,“人”的意义和价值不断被放大,“暴风雪”中的知青英雄,上任伊始的改革精英,忍辱负重的“李顺大”以及启示探索的“章永璘”,成了社会人文的神话。新时期文学所特有的人道主义、理想主义和启蒙意识被消解在“烦恼人生”之中。“新写实小说”将近年来中国文学的悲凉、失落和重构的努力基本上都涵盖进来了。含而不露的语言,不事编造地展示生活之流的自然平实的叙述方法和结构形式,平静、冷漠、冷峻、不介入的视角,使其充分表现出对读者的尊重,也使读者较易认同并接受。

六、九十年代文学景观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转型,国家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步伐正在加快,商品经济意识不断渗透到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统治了中国近四十年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加速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在这种情形下,90年代初文学的基本特征表现为:

首先是80年代文学思潮线性发展的文学史走向被打破了,出现了无主潮、无定向的现象,几种文学走向同时并存,表现出多元的价值取向。如宣传主旋律的文艺作品,通常以政府部门的经济资助和国家评奖鼓励来确认其价值;消费型的文学作品是以获得大众文化市场的促销成功为其目标的;纯文学的

创作则是以圈子内的行家认可和某类读者群的欢迎为标志,出现了文学多种走向的开放局面。其次是作家的叙事立场发生了变化,从共同社会理想转向个人叙事立场。90年代有许多作家的社会历史观点非常接近,但他们却以各不相同的方式来抒写并寄托他们所体验到的时代精神风貌,几乎每一个比较优秀的作家都拥有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联系着他们个人生命中最隐秘的经验。其三,由于时代“共名”的消失,使一批面对自我的作家在开拓个人心理空间方面的写作实验得以实现。个人立场的文学叙事促使文学创作从宏大叙事模式中摆脱出来,转向更贴近生活本身的个人叙事方式,一批被称为“新生代”的青年作家和女性作家应运而生。作家们在相对自由轻松的环境里逐渐造就了属于自己的创作风格,创作出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品,如张承志的《心灵史》、张炜的《九月寓言》、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等,都堪称是中国20世纪最后十年文学界的重要收获,也是本世纪文学舞台上的一道庄严的落幕。以“五个一工程”为标志的文学作品,高奏主旋律,出现了一批反映重大题材、传达时代精神的作品;精英文学作为严肃作者长期积累、由血到墨的成果,有《白鹿原》(陈忠实)、《长恨歌》(王安忆)、《曾国藩》(唐浩明)、《雍正皇帝》(二月河)等。

九十年代初,当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一些作家弃笔从商的时候,陕西作家却突然爆出了大冷门。1993年,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高健群的《最后一个匈奴》、京夫的《八里情仇》相继在北京国家级出版社出版,发行几万、十几万册。再加上前几年获“茅盾文学奖”的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获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的贾平凹的《浮躁》,以及获得一片赞扬声的李天芳、邹志安、杨争光等作家的作品,陕西的作家确实给文坛带来一股强劲的冲击波,有人称之为“陕军东征”。

九十年代城市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深化改革中的艰难,为都

市文学的勃兴提供了契机。深圳的《特区文学》和上海的《上海文学》开辟了以“新都市（市民）文学”为标榜的专栏、专辑。《车间主任》、《大厂》等都触及了都市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状态。作家们以城市人的身份感受城市、理解城市、表现城市，解读着改革和现代化的困惑。一方面描绘城市人的精明、智慧和力量，一方面凸显人们在商品、金钱、欲望、丑恶裹挟下的妥协和挣扎，寻找在文明被撕成碎片时人的价值与操守。

文学中的女性话题和女性策略以其不可忽略的态势，对九十年代中国文学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私人生活》等作品引发了不少争议，但女作家自认其是“化血泪为歌吟”的写作，是各自找到了女性和世界对话的方式。全国性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对女性文学思潮相当关注，专门设立了女性文学委员会，在1995—1997年间，分别以“女性文学的性质及其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地位”、“当代女性文学的本体特征”和“九十年代女性文学思潮特征与流向”为主题，举行了三届热烈的学术研讨会。女性文学专家、学者和女作家从不同的角度，就“女性意识和超性别意识”、“性别/位置/角色/属性”、“女人语言”、“女性文学的价值目标”、“女性文学与人类精神命运”等问题进行了观点相异又互补的争鸣。而《红罂粟丛书》、《红辣椒丛书》、《金蜘蛛丛书》、《莱曼女性文化书系》的出版，对九十年代中国女性文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现实主义近年来在中国大陆出现了新浪潮。写反腐倡廉的《苍天在上》（陆天明），写农村悲情的《日光流年》（阎连科）等是直接关注民族国是、表现社会生活的作品，引起读者的共鸣。但如今的现实主义已不粘滞于实写时事，而走向了发展、开放、多元，出现了“生存现实主义”、“体验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现代现实主义”等说法。切入点也日见多样：有以文化为视角的，如王蒙的《恋爱的季节》，有以个体融

入“土地、家园、人民”为视角的，如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传统的现实主义在揭露社会、历史、现实生活的矛盾时，擅长以论证法做出明确的是非判断，如今的写实作家的志趣并不在论证完美或不完美，而把问题作为背景，目光投注到人生百态、世间悲喜。传统的现实主义（如五六十年代）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往往是“高大完美的好人”和“五毒俱全的坏人”两两对峙，如今的现实主义写“人”时已不再脸谱化、单一化，而更切合各种各样的“原生态”人丰富复杂的精神风貌。

悠久的散文传统在九十年代又再度兴盛。尽管有“快餐散文”在诸多“副刊”、“小报”上的泛滥，严肃的散文家们仍以品味纯正的创作坚守一方净土，每年约有二百多种散文集出版。散文成了老、中、新三代作者生命的律动，心灵的裸呈，魂魄的栖所，精神的家园。内化的主体人格由里向外自然“倾吐”，使之既贴近现实也贴近心灵。中生代散文家为追求散文的品位而挣扎苦斗，如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等，均以灵动的悟性和智慧自成一格。六十年代出生的散文作者通常被称作“晚生代”，他们力图进一步打破古典的和近代的散文把握世界与自我的方式，在新一轮中西文化的融合中催动散文文体发展衍化。

萧乾在《书评研究》中说：书评是现代文化巨厦一根不可或缺或梁柱；书评家应是一个聪明的怀疑者；好的书评要用极简练的文字表现出最多的智慧。我们选编的是一部文学作品和文学研究的书评集，和一般文学史的评介不同，书评作品因其与文学作品的同步性往往更真实地透露着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让人们触摸到那个刚刚过去的时代的一幕幕文学景象。而又是这些，参与塑造了中国现代以来的整个精神现实。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中国百年文学史的一个佐证或写照。